

抗日救国联合会时，积极开展上层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中共河北省筹划了冀东大暴动，姚依林参与了冀东暴动的组织和发动工作。在他的提议下，河北省委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并成立了党团，姚依林为党团成员。

1938年5月，天津武卫会做出冀东大暴动的具体安排，并决定成立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组建冀东抗日联军。为同党

中央接通电信联系，姚依林设法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使党中央能够及时指导冀津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8年7月6日，以滦县港北起义为开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冀东大暴动，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为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转自《唤起全民族的抗战——“一二·九”运动人物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沈学明、李炎主编）

杨学诚：革命青年的光辉典范

○杨冬明 何吉林（1970届无线电）



杨学诚烈士

杨学诚，1915年8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宁岗村。1934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转哲学系学习。

1935年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担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以后又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城西书记。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学生南下，9月初到武汉，根据中共长江局指示组建中共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委员。组建武汉青年救国团，任青年救国团总团书记。翌年6月，

中共湖北省委成立，任省委委员、省青运部部长。

1938年4月起，历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豫鄂边区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江南指挥部）政治委员。1942年当选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副主席。

1944年3月7日病逝于抗日前线的大悟山高家洼，时年29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从寒门学子到热血青年

杨学诚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杨祥和给地主当长工，母亲黄氏操持家务，养育杨学诚兄妹5人，家境十分贫困。

杨学诚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因家贫无钱上学，经常到私塾的窗下偷听先生讲课，用树枝当笔，在地上学着写字。父亲感其诚，卖掉仅有的一点薄地，送他入私

□ 纪念一二·九运动90周年

塾读书。后来本家二伯父杨祥华见他既聪明又勤奋，就资助他到汉口蔡家巷新民小学学习。1927年杨学诚考入武汉市第一中学，时值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少年杨学诚心中种下了向往社会进步和革命的种子。

1930年他考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由于经费困难，他只好白天读书，晚上做工。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武汉和其他全国大城市一样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杨学诚这位热血青年，早已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官僚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积极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他斗争坚决、言辞激烈、令人注目，是学生运动的中坚骨干，因此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逮捕。由于武汉三镇广大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大力营救，才获释放。通过这次斗争，使他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也更坚定了献身革命的决心。

爱国学生运动的“少壮派”

1934年秋，杨学诚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杨学诚积极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

为了使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华北农村，党通过北平学联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杨学诚在由清华、燕京、辅仁、中法等校学生组成的第三团中担任先遣队员，每天打前站，给全团同学准备伙食、住宿，每天天没亮就起身。数九寒天的北方，严寒刺骨，杨学诚没有自行车，徒步跟着骑自行车的先遣队员赶路，特别辛苦，完全是竞走式的半跑半走，如此奔波了一个多星期，当宣传团走到固安的时候，他由于过度劳累病倒了。

在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下，南下宣传团三团半途被迫返回北平。返校后，杨学诚参加了爱国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他在参加民先组织的救亡活动中，一贯积极、认真和负责。在寒风刺骨的冬夜，他冒着冷风守夜；在开大会的时候，他为会场巡逻放哨；一切比较艰苦且一般学生不大乐意做的事，都是他积极去做。随着斗争的日益尖锐，原本温良谦逊的杨学诚，性格也变得更加激烈和坚定，同学们都视他为“少壮派”。他对于恶劣倾向，如眼睛对灰尘一样不能容忍，一见到有对工作不负责的事情，他会疾言厉色地批评指责。至于对造谣、污蔑、蓄意破坏救亡运动的少数右翼学生，他就更加怒不可遏。每逢这些卑劣的家伙胡吵胡闹，在开会时故意扰乱会场秩序的时候，他常常气得面红耳赤。在清华学生会主办的一个反法西斯晚会上，有个丧失民族天良的东北籍学生，跑到会场来破坏捣乱，一面破口大骂，一面打翻了立在会场门口写着抗日口号的红绿灯笼，乱撕会场标语。杨学诚带头振臂而起，率领同学们给了他一顿迎头痛击，使他后来再不敢出头捣乱。

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军警到清华



准备出发
参加南下宣传团的杨学诚

大学抓人，清华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北平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和清华民先纠察队长方左英相继被捕。杨学诚和同学们奋力将蒋南翔等夺回，并且将开到学校来的几辆警车砸毁。傍晚，又发生了5000军警包围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的严重事件。在那几天紧急的日子里，杨学诚毫不顾及自己的危险，为蒋南翔提供掩护，帮他打听消息，最后帮他设法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大搜捕之后，白色恐怖一直笼罩着清华园，特务活动猖獗，右派势力气焰嚣张。面对这股政治寒流，清华民先重新改选了领导班子，选举杨学诚、李昌等5名同学组成新的大队部，从此清华民先又活跃起来，他们同右派学生组织的“护校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河北北平高中一位18岁的学生郭清被捕入狱后，遭到惨无人道的拷打和折磨，于3月9日惨死狱中。北平学联决定于3月31日在北大三院举行追悼郭清的大会，一位东北籍学生弄来一口白木棺材，摆在礼堂中央，棺前挂着郭清的速写像，会场一片悲痛的气氛。由于国民党军警封锁了校门，愤怒的学生们把墙拆开了一个缺口，打头阵的清华学生杨学诚、李昌等抬起棺材就冲上街头，显示了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

在党组织中成长为成熟的革命战士

当时清华进步同学把入团叫作“入中学”，入党叫作“入大学”。杨学诚经过多时的观察，机敏地发现李昌似已是在党的人了。有一天杨学诚和李昌、凌松如等在宿舍闲谈，杨对李说：“老李，看样子你入了‘大学’了，你不能一个人‘入大学’，把我们丢在外边呀！”李昌直率地答道：“好吧，我就做你们的入党介绍

人。”杨学诚于1936年5月6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学诚入党后，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进步十分鲜明。入党前，他在救亡运动中还只是一位怒目挥拳、见义勇为的斗士；入党以后，经过党的教育，他逐渐地习惯于全面思考问题、分析是非、以智取人、以理服人。

同年秋，杨学诚担任了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当时清华大学是北平学生运动最激烈的斗争阵地之一。各派政治势力交混庞杂，就是左派学生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杨学诚头脑非常清醒，他在各种会议上，都以自己在演说和雄辩方面的出色才能，极有说服力地宣传着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批驳了国民党卖国投降的无耻滥调。在一二百人的民先大会上，他常常能以一篇热烈的演说，使大家都振奋起来。斗争的实践使他成为清华大学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之一。

1937年5月，作为北平学生运动中的党员代表之一，他和黄敬、李昌、林一山一起，随着刘少奇、彭真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主席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并亲自同北方青年谈了话。杨学诚和李昌在会议上发了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见，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学生的思想。后来，毛主席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的结论部分，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解答，使杨学诚心悦诚服，并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

返回北平后，杨学诚任中共北平市学委委员、城西区委书记，参与领导北平的

学生运动。

以身殉国，血洒疆场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杨学诚和蒋南翔一起组织进步学生撤离。1937年7月29日上午，他俩设法通过日寇的重重岗哨返回清华园，分别将藏在那里的秘密文件烧毁。后又集合起城内部分民先队员，撤到天津并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民先队员北上参加抗日游击队，另一部分南下传播抗日救亡的火种。杨学诚和蒋南翔等随队南下，先后建立和领导济南和南京的平津流亡同学会，并为平津流亡学生会的主要领导成员。

1937年9月初，杨学诚根据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的指示，从南京来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委员、湖北省委青运部长，把“一二·九”运动的火种播向武汉三镇。在武昌三道街39号、15号两栋房子里办补习学校，作为活动据点。杨学诚根据“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工作的经验，认为必须组织一个包括工农青年在内的青年骨干团体，才能带动广大青年。经与蒋南翔等商议后，决定在12月9日那天召开“一二·九”两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宣布成立青年救国团，会议由杨学诚主持。那天，会场的气氛很热烈，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救亡歌曲。会后，组成了一支游行队伍，从武昌走到汉口，热烈的抗日气氛大大活跃了武汉三镇，推动了抗日救亡的浪潮。接着省青委又召开了会议，围绕抗战形势、青年救国团的性质和宗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1937年12月28日，武汉青

年救国团（简称“青救”）正式诞生，杨学诚担任总团书记。青救的发展异常迅速，1938年武汉就有青救团员1万多名，再加上各地团员包括农民达5万多名。当时曾有“北有民先，中有青救，南有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之说。他们活跃在工厂、矿山、农村、街头，发动市民，使武汉三镇抗日热情沸腾起来。

当南京沦陷，武汉成为日寇进犯的主要目标时，杨学诚同姜纪常、孙世实等同国民党省党部经过三番五次的斗争，终于组成了武汉第一个救亡宣传组织——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该团逐渐发展到30多个队，在湖北各地城乡宣传抗日，有力地推动了湖北省的抗日救亡运动。

武汉失守前不久，他在与蒋南翔商议工作时，见到清华老同学何礼，他说：“老何，我们正在商量下乡打游击的事。我是湖北人，更得下乡去自己干了。你帮我买个滚筒油印机，这样印东西快一点。”

1938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派他前往鄂中应城开辟鄂中根据地，他率领一支只有8支枪的“应城县潘家集商民自卫队”，首先拉到大洪山区的丁家冲准备打游击。他很珍惜这8支枪，日夜不离，甚至亲自站岗放哨。正是这支队伍和其他不断汇集来的队伍最后组成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简称“应抗”），后来成为鄂中我党领导的主要抗日武装。

杨学诚本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但当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他拿起武器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干。他很快就学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成为一名出色的领导者。先后担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江南指挥部）政治委员、鄂豫边区

行政公署副主席。

在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6年，杨学诚生活在前线，战斗在前线，领导十分复杂的抗击敌、伪、顽的斗争，终致积劳过度，患了严重的肋膜炎。他在已不能骑马的情况下，仍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鞠躬尽瘁。最后不幸于1944年3月7日在转战途中病逝于湖北省大悟山北麓的高家洼。

杨学诚是“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干部，经过艰苦锻炼和战火考验，最后成长为战斗在抗战前线的指挥员，把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献给了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转自《唤起全民族的抗战——“一二·九”运动人物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沈学明、李炎主编）

一二·九：父亲熊向晖革命生涯的指路明灯

○熊 蕾

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原名熊汇荃。1936年9月至1937年7月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36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蒋南翔、杨学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8年获得美国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驻英国常任代办、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驻墨西哥大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于父亲熊向晖来说，“一二·九”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更是他找到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明灯。

寻找共产党

“一二·九”运动发生时，我父亲正



1991年，熊向晖（右）与宋平两位学长亲切交谈

在江苏省立南京中学读高三，时年16岁。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是当时全省最好的中学，荟萃了来自不同省份的优秀学子。父亲在南京中学高中部的学习成绩优异，在他们1936届毕业生纪念册中，一位名叫杨承栋的同学这样描述父亲：“明敏的头脑，干练的才能！在功课上，获得全级最高的Marks（分数）；在年龄上，是全级最小的数字——十七。”

这位杨承栋比我父亲年长两岁，后来改名许立群，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过中宣